北朝历史

DOI:10.19970/j.cnki.ISSN 2096-9708.2023.01.004

北魏平城文明的内涵

倪润安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平城作为北魏都城近百年，汇聚了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发展和创造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平城文明，其内涵可包括都市文明、陵寝文明、军事文明和宗教文明四大方面。都市文明围绕着宫城布局、城圈设置和城郊墓葬特点展开。陵寝文明的核心是北魏金陵，需要在细致地调查和测绘方山永固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平城北面分布着长城、长堑、六镇、塞围等军事防线，共同构成了军事文明的主要内涵。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是宗教文明，表现为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佛教文明，初步形成了“云冈学”。对北魏平城文明内涵的探讨还很不均衡，需要加速发展。

关键词：平城文明；都市文明；陵寝文明；军事文明；宗教文明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08(2023)01-019-12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1](卷110《食货志》,P2850)此后近百年间，在京师及其周边，北魏逐步汇聚和整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发展和创造了新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平城文明。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看，其内涵至少可以包括四大方面，即都市文明、陵寝文明、军事文明和宗教文明。

一、北魏平城的都市文明

天兴元年正月，北魏灭后燕，道武帝亲临邺城，“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1](卷2《太祖纪》,P31)七月，最终选择平城为都城后，邺城是其将要模仿的样本之一。“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木数百万根”。[1](卷23《莫题传》,P604)北魏平城由宫城、中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是逐步建设完善起来的。

最先是在原汉代平城县城的西部营建宫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从天兴元年至六年（403年），依次建成了天文殿、天华殿、太庙、太社、太稷、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西昭阳殿等。天赐元年（404年），筑西宫。[1](卷2《太祖纪》,P33-42)此时，所筑西宫是将已建成的宫殿和近旁苑囿，通过筑墙与原汉平城的东部隔离开来，成为独立的宫城，即所谓“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2](卷57《魏虏传》,P984)

到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1](卷2《太祖纪》,P42-43)道武帝兴建灅南宫，并在其周围建苑囿和外城，是在实施他早几年前规划的南平城。天兴六年（403年）九月，道武帝“行幸南平城，规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1](卷2《太祖纪》,P41)此时，平城的宫殿区建设刚刚初具规模，本可趁势修筑外城，道武帝却未将早已期许的邺城模式移植过来，态度相比天兴初年发生了变化，显示出了对天兴制度汉化方向的迟疑。于是，他异地在南平城首先试验了邺城模式。灅南宫应是南平城北部的宫城，设有苑囿，外城主要在宫城南侧，设有居民区——里，以及市场，还有齐整的街道。这明显受到了魏晋十六国邺城结构和布局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魏晋洛阳城设“市”的做法。

邺城模式应用到平城，在宫城外修外郭城，则晚至明元帝末期。泰常七年（422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1](卷3《太宗纪》,P62)《南齐书》称“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2](卷57《魏虏传》,P985)平城外郭城设“坊”，而不像南平城外城那样设“里”，表明明元帝为应对柔然

收稿日期：2022-08-21

作者简介：倪润安（1974–），湖北隋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汉唐考古、民族考古。

侵扰的加剧，开始加强平城的防御，修建了外城。“坊”比“里”具备更严格的围墙防护设施。把“里”改造成“坊”是北魏平城因应形势的创造性举措。

明元帝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时，计划对平城开始新的扩建。《魏书》记载泰常八年（423年），“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1](《卷3《太宗纪》，P64)其中包含了两项工程：一是扩建西宫，将宫城范围扩展到了原汉平城的东部；二是在西宫外修筑周长达20里的外垣墙，成为中城。[3]紧跟着外郭城，又筑中城，是明元帝进一步保卫平城、防护宫城的有力措施。此时北魏在与柔然的较量中不占上风，深感京畿之地受到严重威胁，修城的紧迫感十足。果然明元帝去世次年，始光元年（424年）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1](卷4上《世祖纪上》，P69)“骑围世祖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1](卷103《蠕蠕传》，P2292)太延五年（439年），柔然可汗“吴提果犯塞，（穆）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1](卷103《蠕蠕传》，P2294)可见，中城确实在紧急时刻发挥过防御的作用。由于特殊的边防形势，促使平城形成三重城圈的新布局特点，为汉晋都城所不见，进而影响到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和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只不过平城的三重城圈并非由内向外依次修成，而是宫城、外郭城先构成符合魏晋洛阳城特点的双重城，再建成第三重的中城。

太武帝时期，宫城内的格局进一步变化，形成了东宫、西宫并重的局面。东宫初设于道武帝时期，时间要早于天赐五年（408年），可能与西宫同时。[4]东宫位于西宫之外的东面，相距不远，面积远小于西宫，符合魏晋洛阳城的做法。明元帝、太武帝即位前都应在此居住。明元帝末期扩建西宫，主要目的应是将东宫纳入了宫城范围，以方便皇太子代理朝政。泰常七年（423年）五月皇太子拓跋焘摄政，[1](卷3《太宗纪》，P62)遂有泰常八年（423年）十月扩建西宫。等拓跋焘正式即位后，便于始光二年（425年）“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1](卷4上《世祖纪上》，P70)作为自己的保母保太后（后尊皇太后）窦氏的居所。平城宫城内，太后居万寿宫（故东宫）、皇帝居西宫，已有模仿东汉洛阳城宫城内皇帝、太后分居东、西宫[5]的意思。延和元年（432年）正月，皇子拓跋晃被立为太子，七月开始为他修建新的东宫；耗时两年，至延和三年（434年）七月，“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1](卷4上《世祖纪上》，P80、81、84)新的东宫分占了全部宫城即扩大后的“西宫”的三分之一。而且东宫如西宫一般“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别有仓库”，[2](卷57《魏虏传》，P984)具有独立性，面积远比以前的东宫大。于是宫城内又形成了皇帝西宫与太子东宫并立的新“东、西宫”格局。在宫城内，恢复东、西宫并重的体制，显示了太武帝追尊、援引“汉制”的意图，有意改变此前模仿魏晋洛阳城的状况，以回避对“晋制”的传承，目的是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

太平真君元年（440年）七月，“皇太后窦氏崩于行宫”。[1](卷4下《世祖纪下》，P93)正平元年（451年），太武帝诛灭东宫集团和太子晃。[6]万寿宫、东宫因此先后被收归皇帝直接控制和使用，“东、西宫”分立格局遭破坏、解体。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太武帝“崩于永安宫”。[1](卷4下《世祖纪下》，P106)正平二年十月，文成帝“即皇帝位于永安前殿”。[1](卷5《高宗纪》，P111)这表明万寿宫被收回后，太武帝亲居于此，改名为永安宫。永安殿称为前殿，为大朝之所；安乐殿则为后殿，为皇帝寝殿。这一变化意味着皇帝的正殿不再偏居旧西宫，有向东移动、更接近中轴线的意向。因此，永安宫当时亦称为“中宫”。太武帝为近侍阉官宗爱所害，“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而立余”。[1](卷94《宗爱传》，P2012)拓跋余所进“中宫”就是“永安宫”。

太安四年（458年）三月，文成帝“起太华殿”，成为新的大朝之所。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崩于此殿。[1](卷5《高宗纪》，P116，P123)延兴元年（471年），孝文帝“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1](卷7上《高祖纪上》，P135)献文帝退位为太上皇之后，移居北苑崇光宫，承明元年（476年）崩于宫城内永安殿。[1](卷6《显祖纪》，P132)

孝文帝太和年间，又对宫城进行了大规模兴建。太和元年（477年）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七月“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贤门”。[1](卷7上《高祖纪上》，P143-144)太和三年（479年）二月，坤德六合殿成。[1](卷7上《高祖纪上》，P146)太和四年（480年）正月，乾象六合殿成；太和四年（480年）七月改作东明观，九月思义殿、东明观成。[1](卷7上《高祖纪上》，P148-149)太和七年（483年）十月，皇信堂成。[1](卷7上《高祖纪上》，P153)太和十二年（488年）九月，起宣文堂、经武殿。[1](卷7下《高祖纪下》，P164)这些殿堂都应建在原汉平城的东部，处于原太子晃东宫的地域范围及附近。至此，原汉平城范围已完全成为宫城，并基本建满了宫殿堂阁。至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孝文帝拆太华殿，在原址新建太极殿，十月时建成。[1](卷7下《高祖纪下》，P169，P171)《水经注·灅水》记载曰：“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

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施以观阁。东堂东接太和殿。”安昌殿当时仍存,陈桥驿的校证指出应为“破太华殿”。[7](P313,P331)

孝文帝拆除太华殿,重建大朝正殿太极殿,在两侧各增一配殿东、西堂,采用的是魏晋洛阳城正殿的名称和形制,再次转向了“晋制”模式。魏晋洛阳城中,太极殿是单一宫城、“建中立极”的标志,[8]平城太极殿的确立亦当如此。这说明太极殿,及原来在同一位置上的太华殿,基本定位在宫城、中城、外郭城的中轴线上。这种意图在文成帝时先规划“建中”,随着孝文帝建设完成东部宫殿建筑群,则落实了以太极殿南北一线为中轴、东西基本对称的宫城布局。

目前,北魏平城考古遗迹被发掘的并不多。在宫城内,发掘了宫殿基址和太仓遗址。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一号[9]、三号[10]、二号[11]遗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中一号、三号遗址为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二号遗址为太仓遗址。一号遗址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44.4、南北宽31.5米;发现的踏道至少有四条:一条位于北缘正中,两条位于南缘、东西各一,东缘可能有一条朝东的踏道。有研究者推测该建筑为太和殿。[12](P32)二号遗址发掘出北魏粮窖5座,均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是“太官八十余窖”的一部分。

在中城东北部,今大同古城内东北隅二十四校斜对面发掘一处北魏皇家佛寺建筑基址,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41、东西宽34米,南、西、北三面的正中各有一条踏道,出土大量北魏时期建筑材料和佛教题材彩色泥塑残件。[13]

在外郭城南门外东南面,发掘了明堂、辟雍遗址。[14]二者合为一体,外圈环形水渠为辟雍,外缘直径约为289-294m,内缘直径约为255-259m,水渠宽约18-23m;中央方形夯土台为明堂,边长42m。平城明堂辟雍,从下诏建造到建成,跨越了六年之久。太和十年(486年)九月,“诏起明堂辟雍”;但真正开始修建是到了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同时将太庙从宫城移建到外郭城南门外,与明堂辟雍并置,“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半年后,十月“明堂、太庙成。”[1](卷7下《高祖纪下》,P161、168)工期拖延的主要原因,在于明堂辟雍的设计方案迟迟不能确定。这源于此前都城在明堂、辟雍的建造上做法不一致。西汉长安城的明堂、辟雍合为一体,外圈为圜水沟,中央为方形夯土台基。[15][16](P197-207,P225-232)汉魏洛阳城的明堂、辟雍是分建的;明堂院落呈方形,院落正中是一座由圆形重廊环绕着方形殿堂的多层台阁式建筑;辟雍建筑群的外围是近长方形的环水沟槽,中心建筑群在外观上呈方形。[17](P80-108,P126-142,P353-362)平城明堂辟雍在经过长时间的斟酌后,最终选择的是西汉长安城的方案。另《水经注·灅水》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7](P315)由此可知平城的灵台也与明堂、辟雍是一体的。这与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均不相同,后二者的灵台始终是分建的。

都市是生人的活动空间,其周边也有着死者的安息之所。平城城郭的扩建和郊外礼制性建筑的设置,对墓葬区的分布有直接影响。平城附近的东郊、南郊是墓葬分布较为密集的两大区域,诸多高官、平民葬于此。平城南部远郊桑乾郡一带,很可能是南朝人降入北魏者的墓葬分布区。[18]通观平城墓葬文化的演变,呈现出与都市发展进程较为一致的节奏。也是先通过天兴年间的制度建设较多吸收了“晋制”因素,后有所停滞;到太武帝时期,又较多地吸收了边疆地区保留的“汉制”因素,从而杂糅各方形成一套新的制度——“北魏制”;从文成帝开始,墓葬文化又逐渐回归“晋制”,到孝文帝晚期完全确立了“晋制”特征。

“北魏制”的表现形式有:墓葬朝向统一规划为坐东朝西;墓葬形制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两大系统,均受到河西文化的影响,流行近似长方形的墓室平面;砖室墓出现一套以墓主人形象为中心的墓葬壁画模式,墓室后壁正中绘墓主夫妇并坐宴饮图,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另一侧壁绘野宴庖厨图,前壁绘武士或力士,题材和构图主要受到河西和东北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葬具出现漆木彩画棺,与西晋重视赏赐“东园秘器”的赙赠制度有关;出现以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为代表的新式陶器,陶器素面或施简单纹饰,平沿陶器的沿部宽展,完全水平;墓主人姓名、身份、葬年等信息的记录方式形式多样,既有砖、石墓志,也有葬具等其他载体。[19]

平城墓葬复归“晋制”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有:墓葬西向的制度发生松动,一部分墓葬仍保持西向,一部分开始转为南向,时代越往后,南向墓葬越多,最后全面转为南向;土洞墓、砖室墓的墓室平面都向着方形转变;墓葬壁画日趋简化、萎缩;漆木彩画棺逐渐消失,新的葬具以石椁、木椁、石棺床、木棺床、砖棺床为特色,一度成为壁画图像转移的载体;

随着墓葬壁画的衰退，墓葬俑群崛起，其构成包括四大组合，即镇墓组合、出行仪仗组合、家居宴乐组合、家居庖厨组合；陶器流行忍冬纹、水波纹、暗纹等构成的较为繁复的纹饰，平沿壶、平沿罐的口沿由完全水平变得向外倾斜；对墓主生平的记录，集中到与西晋一样的长方形砖志、碑形或长方形石志等专用墓志上。[19]

二、北魏平城的陵寝文明

北魏平城北面近郊本为禁苑区，墓葬不得埋入，直到冯太后永固陵的出现。北魏平城时代的皇陵为金陵，离平城较远，冯太后不愿“远祔山陵”，而选址方山。方山永固陵是北魏迁都洛阳前的最后皇陵区，是探索北魏陵寝制度发展的中继点，上可溯北魏金陵，下可及洛阳北魏皇陵。北魏平城时代的陵寝文明包含了金陵和永固陵两大部分，但对其形制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认知还很模糊。

关于北魏金陵的名称和位置，文献有“金陵”“盛乐金陵”“云中金陵”三种记载。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20]、张焯《北魏金陵考索》[21]均认为金陵只有一处，三种记载是一地异名。具体位置上，前者认为是在山西右玉县境内群山的顶峰，后者认为应在盛乐南的群山之巅。古鸿飞《北魏金陵初探》则认为金陵有三处，云中金陵在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盛乐金陵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没有冠以地名的金陵在山西右玉县境内。[22]刘溢海《北魏金陵探究》[23](P94-103)，魏坚《金陵与畿上塞围》[24](P210-221)支持金陵只有一处的观点。魏坚进一步指出山西左云五路山及其与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交界处一带区域，应是北魏金陵所在地。

由于位置存疑，金陵考古学研究长期无法进展。要取得突破，必须先建立可靠的参照物，即从已知皇陵去探寻未知皇陵。而迁洛前的已知皇陵只有方山上的永固陵和虚宫万年堂。永固陵经正式发掘，是追寻金陵的可靠基点。对永固陵的调查活动由来已久。北魏时，郦道元已通过实地调查在《水经注》中记录了永固陵的地面建筑与布局。[7](P312-313)近现代以来，永固陵也持续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925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A. G. Wenley等勘查方山遗址，对相关遗迹的分布做了测量和考证，绘制了从永固陵至思远佛寺的轴线布局略图。[25](P223-232)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永固陵遗址进行了两天踏查。1939年、1941年，水野清一等两次对方山遗址进行调查。[26](P7,P10-12)1976年，宿白对永固陵南侧的思远佛寺遗址进行调查。[27](P31-49)另外，永固陵遗址还进行过两次正式考古发掘。第一次是197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发掘永固陵。[28][29](P145-156)第二次是1981年大同市博物馆发掘思远佛寺遗址。[30]

永固陵历经盗掘，墓室内出土遗物很少，陵园内多数建筑的性质也不确定。因此，研究者们多是宏观性地探讨其陵园特点和文化源流。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首先提出墓地和佛寺结合是冯氏墓园的布局特点，并影响到北朝晚期陵墓。[31]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3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33](P44-45)、张庆捷《北魏永固陵考察与探讨》[34](P222-234)、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35]、王飞峰《关于永固陵的几个问题》[36]等都继承或发展了这一观点。曹臣明《北魏方山永固陵地理环境的选择与陵园制度》[37](P114-119)、村元健一《北魏永固陵の造営》[38]、王雁卿《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39]、沈睿文《永固陵与北魏政治》[40](P57-77)等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永固陵陵寝制度对中原制度和汉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岡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學會1939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以东亚考古学会1939年永固陵调查的收集品为中心，研究了思远佛寺与思燕佛图的关系、永固陵布局对高句丽的影响、永固陵与云冈石窟造营者的关系、来自西方样式和南朝的影响等问题。[41]

纵观永固陵百年来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历程，历时长，研究进展却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迄今对永固陵陵区的构成与布局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认知，细节不清晰，性质判断不明确。张庆捷《北魏永固陵考察与探讨》将永固陵遗址分为山上、山下两部分，对相关建筑的考察较以往都多，取得较大进展，可惜没有绘出分布图，在调查范围和对象上仍有较大扩展空间。下一步应当先从方山永固陵开始，通过全面的实地调查和测绘，完成详实的永固陵陵区布局图，进而分析永固陵的地理形势、构成要素、形制特征、文化渊源和政治内涵等。然后，调查、测绘北魏金陵各疑似陵区的地形地貌、建筑遗迹等，与永固陵进行比较，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比较直接的文化演变关系。由此推进对北魏平城陵寝文明的分析和理解。

具体而言，对方山永固陵的调查和研究，可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永固陵陵区布局的调查与测绘

永固陵陵区从南到北可依次分为四区:第Ⅰ区从灵泉池南口至方山入口处,涉及孤山遗址、灵泉池等。第Ⅱ区从方山入口处至方山南坡二级台地的坡前建筑群,包括御道、门阙、瞭望台、思远佛寺、斋堂、院落等。第Ⅲ区为方山山顶南端的陵墓及其附属建筑群,包括登山御道、永固堂、鉴玄殿、永固陵、万年堂等。第Ⅳ区从万年堂往北直至明长城沿线的建筑群,分布着多处院落、建筑台基和阙台等。另有方山石窟、灵泉宫,所属区段不详。应利用多种测绘手段绘制永固陵陵区布局详图,进而分析陵区的地形特点、主要建筑的规模与形制、各建筑群的组合关系等。

(二)永固陵陵区道路系统与主体建筑考证

永固陵陵区的道路系统比较复杂。从山脚的御道入口到半山腰的思远佛寺,沿途发现多处门阙、人工改建的坡道、"之"字形登山道路、石台阶、围墙、瞭望台等。从思远佛寺北侧登临方山顶部的道路,除了南侧断崖上的"之"字形御道,东西两侧还各有马道上山。御道的两侧翼也各有道路上山。这些道路与陵区各组建筑形成有机的整体。目前,对陵区主要建筑的认定不尽一致,除了已明确的永固陵冢、万年堂陵冢和思远佛寺外,永固堂、鉴玄殿、灵泉宫、文石室、斋堂、南门外二石阙等建筑的位置均不能确定。根据御道的走向和功能,有助于结合沿线建筑遗迹的分布与特征来判断主要建筑的性质,并推定相应的名称。

(三)北魏永固县考

永固县是为守护永固陵而设置的奉陵邑,承袭汉制,构成了北魏陵寝制度的新内容。但永固县的位置至今不能确定。而位于方山中后部的永固陵陵区第Ⅳ区,面积较为广大,发现多处院落遗址,有的内有建筑台基,还发现阙台和门址等,比较符合城址的特征。全面调查和测绘第Ⅳ区所见建筑遗迹,总结其形制特征,判断其时代和性质,可讨论其与永固县对应的可能性。

(四)永固陵墓葬形制分析

永固陵墓葬形制包括地上封土和地下墓室两部分。高大的封土呈圆形,基底为方形。墓室为砖砌前、后双室墓,没有侧室。墓室四壁裸砖,无壁画,仅有石门框上雕刻一些佛教题材的图像。永固陵贵为权力显赫的冯太后之墓,建造简朴,是北魏平城墓葬制度由"北魏制"转向"晋制"的一个例证。可在平城墓葬制度演变的大背景下来分析永固陵墓葬形制的形成过程和表现方式。

(五)"祁皇墓"故事与永固陵的出现

永固陵,俗称"祁皇墓"。方山西侧、御河西岸还有一村子叫"祁皇墓"村。祁皇后并不是冯太后,而是西晋时期拓跋代国桓帝猗㐌的正妻,长期以太后身份把持国政,曾多次主导代国可汗的废立。冯太后的身份和政治经历与祁皇后颇为相似。后者的故事从鲜卑传统而言,增强了冯太后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探讨代国时期桓帝与祁后的政治活动,"祁皇墓"村是否是永固陵的守护者,祁皇后墓是否也在方山附近,祁皇后故事对永固陵选址的影响等问题,可进一步揭示永固陵出现在方山的历史渊源。

(六)从苑囿到陵园:方山政治礼仪的表达

方山在成为冯太后的陵园前,是先作为苑囿。太和五年(481年),冯太后与孝文帝同游方山后,方山才开始逐渐向陵区转变。方山在永固陵建成前后,均是北魏举办重大政治活动、表达政治礼仪的重要场所。方山从苑囿到陵园,并兼具二者之功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表达。可从方山地理形势的寓意、佛寺入陵、方山二陵关系的构建等方面探讨永固陵的政治内涵。

对北魏金陵的调查和研究,首要目标是验证其可靠性。北魏金陵疑似陵区分布在内蒙古与山西的交界处。从山西右玉县西马头山、大南山、西团山,左云县五路山,至内蒙古凉城县东马头山的连绵山岭上,发现数十座高大的封土冢,曾引起宿白、俞伟超、魏坚等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始终未进行过考古发掘,实地调查也比较粗简,而未能确定为金陵。应深入踏查和测绘各疑似陵区的地形地貌、封冢分布与形制、周边设施等,以便与方山永固陵进行对比研究。从现有信息看,永固陵与金陵疑似陵区至少在选址上颇有相似之处。方山山顶为平地,东、南、西三面是悬崖陡壁,南北地带狭长。而右玉西马头山、凉城东马头山的地形地貌都与方山相似,或体现了一定的选址模式。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共同之处,显示出继承关系。如能验证金陵的可靠性,还可考证相关陵区所葬帝、后,及随葬者的情况。一旦北魏金陵得以确认,将对北魏乃至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起到重大推进作用。

三、北魏平城的军事文明

北魏定都平城后不久,就面临着来自漠北柔然汗国的威胁。从天兴五年(402年)至太和十一年

(487年),是柔然的兴盛时期。这80余年间,柔然主动发动对北魏的战争达10次,并且大多发生在北魏与其他政权发生战争或者国内政局不稳时,而北魏则9次出兵柔然,有4次还击,5次主动出击。[42]双方战事频仍,北魏北部边境不得安宁。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明元帝至太武帝前期,平城的防御形势十分严峻。为有效应对柔然,拱卫京城,北魏不仅在泰常七年、八年先后修建了平城的外郭城、中城,还在平城北面陆续建设了一系列军事设施和防线,包括长城、六镇、"畿上塞围"、长堑等,构成了北魏平城军事文明的主要内涵。

(一)泰常长城

关于泰常长城的修建,《魏书·太宗纪》记载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卷3《太宗纪》,P63)另《魏书·天象志》也载曰:"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1](卷105之三《天象志三》,P2400)修筑这条长城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应对强势南侵的柔然。在此之前,柔然分别于天兴五年(402年)、天赐三年(406年)、永兴元年(409年)、神瑞元年(414年)多次侵扰北魏边境,而北魏仅在永兴二年(410年)对柔然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收效不大,处于被动状态。距神瑞元年将近十年后,明元帝却在泰常七年、八年连续修建平城外郭城、中城以及长城,是因为他"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1](卷3《太宗纪》,P62)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预测柔然必会趁帝位变动之际大举南侵,又担心新即位的拓跋焘难以应付,故而未雨绸缪,采取了以修墙为措施的防御策略。

泰常长城东西跨度大,"延袤二千余里",要在短期内新修完成,工程量很大,十分困难。经调查表明,除在河北省发现遗迹外,内蒙古境内还无任何泰常八年长城遗迹发现。因而,该长城应是救急之举,只新修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缮和沿用了战国赵北长城和秦汉长城;其东起今河北省赤城县,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沿内蒙古阴山南麓一线,西端到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和乌拉特中旗查石太山之间,总长度约700公里。[43]

(二)六镇

关于"六镇"的形成,严耕望先生论述道:"颇疑神麚二年(429年)冬始置降民于漠南时,仅诏平阳王等四人镇抚之,尚无定制。至延和二年(433年)置怀朔镇(时名五原),其他五镇亦同时所建置,东西并列,以镇抚降民,且备御北寇,故有'六镇'之名耳。"[44](P704)可知设六镇的背景是太武帝前期北魏对柔然的主动反击取得大胜。

太武帝刚即位的始光元年(424年)八月,柔然果如所料,率六万骑前来进犯,"世祖亲讨之",将柔然击退。[1](卷103《蠕蠕传》,P2292)当年十二月,北魏主动反击,发起北伐,太武帝"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车驾次祚山,蠕蠕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始光二年(425年)十月,"车驾北伐,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之,蠕蠕北走"。神麚元年(428年)七月,柔然可汗"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神麚二年(429年),北魏再次北伐,给以柔然重大打击。四月"车驾北伐",五月"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烧庐舍,绝迹西走"。十月,"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1](卷4上《世祖纪上》,P70-75)这些新民包括"前后归降三十余万"的柔然部众和"望军降者数十万"的高车部众。[1](卷103《蠕蠕传》,P2293)在御驾亲征、屡次大胜柔然的形势下,北魏军队不需要龟缩到泰常长城以南进行防守,而可以前出到长城北侧,并试图镇抚和利用归降的游牧部众进行防御。这标志着泰常长城以北又形成了一道由多处军镇构成的新防线,其特点是军镇之间相互策应,但不以长城相连,而以"游军"形式巡防。《魏书·来大千传》载延和初,"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1](卷30《来大千传》,P725)表明军镇防线确定为"六镇"是在太武帝延和年间。严耕望先生则以怀朔镇建置之年延和二年(433年),作为"六镇"正式形成的时间。

关于"六镇"的名称和方位,清代学者沈垚考证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45](卷1)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牟发松进一步认为,在太武帝之初,"六镇"是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无沃野;太武以后太和十年(486年)以前,北迁的沃野镇才取代赤城镇而列入六镇;正始年间(504-508年),又将御夷镇纳入六镇防线。[46]日本学者佐川英治认为大约在太延年间(435-440年)北魏在阴山南麓设置了怀朔、抚冥、柔玄、怀荒四镇,与此前已设置的武川、赤城二镇逐渐被统称"六镇";太和年间,御夷镇取代了赤城镇;正始年间,北迁的沃野镇纳入六镇。[47](P55-128)

从沃野到怀荒的范围之内,现发现10余座北魏城址。对这些城址与六镇的对应关系,学者们颇有

分歧。其中比较公认的是将沃野镇定在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将怀朔镇定在固阳县白灵淖城圜圖古城,将抚冥镇定在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48]根子场古城由东西并列的三城相连,平面略呈倒“凸”字形,全城周长3500多米。白灵淖城圜圖古城为单城,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周长近5000m。乌兰花土城子古城由东城、西城对接组成,西城连接于东城的西北端;东城平面呈方形,边长900m,周长约3600m;西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东西长1170m,南北宽1086m,周长可达4500m。这三座城址的规模都比较大,说明镇城大小是有一定规格的,不会太小。除了这三座城,规模能与之大致相当的还有三座,分别是尚义县哈拉沟古城、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武川县二份子古城。哈拉沟古城为单城,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周长4200多米。克里孟古城为内、外城结构,外城平面呈近梯形的四边形,周长达4000多米,内城位于外城东部,周长近2000m。二份子古城为单城,平面呈方形,东北角内折,周长2800多米,接近3000m。[49][50](P1-17)[51][52](P60-78)这六座城址周长在3000-5000m左右,应与“六镇”相对应。按从西向东的地理位置关系,根子场古城、白灵淖城圜圖古城、二份子古城、乌兰花土城子古城、克里孟古城、哈拉沟古城可依次对应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

(三)畿上塞围

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1](卷4下《世祖纪下》,P101-102)“畿上塞围”实际上是泰常长城内侧、更贴近平城的又一道长城。其长度不及泰常长城一半,但因为是新建,用工十万,耗时近两年尚不得完成,最后因大饥荒才罢除。此亦可证泰常长城乃大多利用旧长城。

为何在建立六镇十多年后,又要再建一道离平城更近的长城塞围呢?这与太延五年(439年)柔然趁虚突破六镇、泰常长城两道防线,深入到平城西南七介山,震骇京师有关。那年“车驾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柔然可汗吴提“果犯塞”,派其兄乞列归对阵北镇诸军,自己趁穆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1](卷103《蠕蠕传》,P2294)这一严重事件警示太武帝北部防线并非万无一失,仍须设法根除柔然对平城的威胁。他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动出击,多次发动北伐,并亲自督战,寻求与柔然可汗决战,直接打击其首脑。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五年(444年)和十年(449年)三年四次征伐柔然,最后一次收获最大,“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二是主动修筑工事,弥补防御漏洞,尤其是针对平城西南薄弱之处。这就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筑“畿上塞围”。双管齐下的结果是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世祖征战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1](卷103《蠕蠕传》,P2294-2295)

“畿上塞围”东起上谷,即今北京延庆西北山地,向西延伸至黄河边上的内蒙古清水河与山西偏关交界处,是一道东北——西南向的塞墙。除保卫京师,北魏王陵金陵也是其守卫的重要对象。在山西和内蒙古境内尚存5段疑似与畿上塞围相关的墙体,均位于明长城内侧且离明长城较近。[43]

(四)太和长城与长堑

孝文帝太和年间,尚书高闾上表,具陈北境戍边之策,建议“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1](卷54《高闾传》,P2294-2295)

孝文帝时期,柔然又开始连年犯塞。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蠕蠕犯塞”,五月闰月“蠕蠕寇敦煌”,“又寇晋昌”,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延兴三年(473年)七月“蠕蠕寇敦煌”,十二月“蠕蠕犯边”。延兴四年(474年)七月“蠕蠕寇敦煌”。太和三年(479年)十一月,“蠕蠕率骑十余万南寇,至塞而还”。太和九年(485年)十二月,“蠕蠕犯塞,诏任城王澄率众讨之”。[1](卷7上《高祖纪上》,P136-156)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十二月,“蠕蠕犯塞”两次。太和十一年(487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叡讨之。”[1](卷7下《高祖纪下》,P161-162)高闾上表劝修长城,背景正是柔然再次频繁南寇。从考古证据看,他的建议得到了部分采纳和实施,在六镇以北又建长城。

太和长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自东向西大致经过内蒙古四子王旗、达茂旗、武川县,总长190余千米,沿线设有17座戍堡。

南线东、中部基本呈东西走向，西部呈东北-西南走向，自东向西依次经过商都县、察右后旗、察右中旗、四子王旗、达茂旗，总长260余千米，沿线设有15座戍堡。两长城交汇于四子王旗。[53](P47-49,P7-9)太和长城及其内侧的抚冥镇、柔玄镇，重点防护着自漠南通往平城的直线通道，起着正面阻击柔然的重要作用。

太和长城东面还有太和年间掘成的“长堑”。《水经注·鲍丘水》记载：“鲍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经九庄岭东，俗谓之大榆河。……大榆河又东南出峡，经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堑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7](P338-339)此处“广长堑”即为“太和长堑”。“太和长堑”基本呈东南——西北走向，东自河北省丰宁县鱼儿山镇大孤山村东北向西北延伸，大体沿川地作直线分布，由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大北沟镇十六号村南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穿行于多伦县和正蓝旗境内，现存总长近50千米。[53](P77-78)

到孝文帝时期，围绕着对平城的拱卫，在其北面自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太和长城-长堑、六镇、泰常长城、畿上塞围四道军事防线，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大、层次多的严密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在明元帝时期初现雏形，太武帝时期基本形成，孝文帝时期进一步完善，具有四重防线犬牙交错、互补互助、层层严防死守的突出特点。[54]

四、北魏平城的宗教文明

北魏灭后燕的过程中，道武帝就已经重视宗教对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年间，他在职官体系里设置了僧、道官员，以僧人法果为道人统，以张曜为仙人博士。法果谨遵皇权，称太祖“即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明元帝即位后，“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延续了道武帝佛、道并崇的宗教政策。太武帝“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他“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此时道武帝有所偏向道教，但并未打压佛教，仍是双方并重。至太延五年（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随着凉州僧众大量涌入平城，一直被帝王维护的佛道平衡局面被佛教强势打破。而新来的僧人们不懂平城规矩，私下与太子、大臣密切结交，触犯忌讳。又在长安发现僧人牵连谋反，私自敛财，不守清规戒律。这些事情终于惹怒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动大规模灭佛事件，“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1](卷114《释老志》,P3030-3035)与此同时，道教大受重视，寇谦之曾试图建造“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的静轮宫，终未成。[1](卷114《释老志》,P3053)

文成帝即位后，复兴佛法，先后任用凉州僧人师贤、昙曜担任道人统（沙门统）。师贤上台后，立即承袭法果的思想，通过实际行动践行“尊皇帝为如来”的原则，照着文成帝的样子雕造石佛像，还将道武帝以来的五位皇帝铸造成铜佛像。昙曜和平初（460年）在武州塞开始凿建五座大像石窟，也是以佛像象征五位皇帝。佛教归顺皇权，也换来了文成帝以国家财力供养佛教的承诺，“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献文帝即位后，“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他重新秉持佛道平衡的宗教政策，但较为偏向佛教，亲自投身佛学，览经书，习义理，试图亲身实践“皇帝就是当世如来”，在发展佛教上多有创举。诸如“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等。[1](卷114《释老志》,P3036-3038)

昙曜始凿的武州塞石窟，即今云冈石窟。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研究者普遍分为三期。1956年，《云冈石窟》调查报告的撰写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所分三期是：第一期包括昙曜五窟，第7、8窟，第9、10窟，下限为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年）；第二期包括第5、6窟，第1、2窟，第11、12、13窟，第14窟，第15窟等，下限为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第三期包括第3窟，第4窟及西部诸窟等，石窟的营造中止于宣武帝正始、延昌之际，有些小龛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55](P1-5)1978年，宿白提出新的三期划分：第一期自云冈石窟始凿至文成帝去世，即460-465年，包括昙曜五窟第16-20窟。第二期约自文成帝以后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第7、8窟，第9、10窟，第5、6窟，第1、2窟四组是“双窟”，另一组是三个窟，即11、12、13窟；云冈最大的石窟第3窟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凿建。第三期自迁都洛阳到北魏正光五年，即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56][57](P176-197)2017年，冈村秀典对云冈石窟三期进行细化研究，将前、中、后三期

各分为3小期。前1期为第18、19、20窟,下限为献文帝天安二年(467年);前2期为第16、17窟,下限为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前3期为第5、13、11窟,年代下限为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中1期为第7、8窟,中2期为第6窟和第9、10窟,中3期为第1、2窟、第12窟、第3窟、第4窟等,中期窟年代下限为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后1期下限为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后2期下限为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后3期下限为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58](P47-49,P105,P264)冈村的小期划分,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各主要石窟开凿年代的范围,有助于理解各窟的时代背景,但各小期下限的年代判断并不完全妥当。

昙曜五窟内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佛、当今佛和未来佛)和千佛,主尊形体高大,或结跏趺坐,或交脚坐,或站立,"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1](卷114《释老志》,P3037)分别对应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皇帝。从遗迹现象的打破关系看,昙曜五窟当初是计划把第19窟作为主窟,按照昭穆制在左右各开两个洞窟。不过,工程进行途中第20窟发生了崩塌,因此将本来应该修建在第20窟西侧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第17窟东侧。因此,第19窟作为五窟的中心窟,主尊代表道武帝,按昭穆顺序,其左侧第18窟代表明元帝,右侧第20窟代表太武帝,左端第17窟代表景穆帝,本应位于右端的第16窟代表文成帝。[59]

昙曜五窟是为北魏前5个皇帝开窟造像。迁都平城后,龙门石窟最早的几座窟也是为帝、后而造。孝文帝为冯太后开凿的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最早的洞窟。[60]到宣武帝时期,"景明(500-503年)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508-512年)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1](卷114《释老志》,P3043)此即为孝文帝及其文昭皇后、宣武帝所营造的宾阳三洞。从云冈到龙门石窟,为皇帝、皇后造窟的传统未断,因而文成帝之后的献文帝、孝文帝,以及二度临朝听政的冯太后都会在云冈开凿代表自己的洞窟。这便涉及到对云冈第5、13、11、3窟性质的判断。

云冈第5窟为大像窟,和昙曜五窟的形制接近,同样是马蹄形窟,主尊大佛结跏趺坐于洞窟中央,占据了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造像以三世佛为主,背光火焰纹依旧属于第一期的样式。第5窟开凿的时间应该紧接昙曜五窟,献文帝时期完成了窟内主体空间的采石工程和几身大像的胚体,以及主尊背光等装饰带的雕刻;后由于献文帝与冯太后政治斗争等原因而不得已停工,到孝文帝真正掌握实权之后,才将第5窟的主尊及两侧立佛完成。[61](P53-63)因此,云冈第5窟应是献文帝为自己所造,由孝文帝最终完成。

云冈第13窟也是按大像窟设计,主尊为交脚弥勒,窟形和主尊都与第17窟近似。第17窟主尊是昙曜五窟中唯一不以佛装形式出现,而着菩萨装的大像,或寓示景穆帝未登基过,与正式的皇帝有所区别。所以,和第5窟年代相近的第13窟,应是献文帝在位时为冯太后所凿。皇帝窟与太后窟并凿,皇帝用佛像,非皇帝的太后用菩萨装形像,以示身份地位有所区别。第11窟是中心柱窟,高度可与大像窟匹敌,开凿时间较第5、13窟略晚,应是在孝文帝即位初期、献文帝任太上皇时期,是为孝文帝所造。

献文帝死后,冯太后、孝文帝二圣并尊,原来为冯太后、孝文帝单独营建的大窟第13窟、第11窟都停止了原计划,[56]转而要另建一座双尊并立的大像窟,能符合此条件的只有云冈第3窟。该窟分前、后室,前室有东、西两个,平面都接近凸字形,东西长约24m,南北宽约7m;后室共用,平面为凹字形,东西长约43m,南北宽约16m,北壁中部为较大的向前凸出的岩体,东西长约29m,南北宽约11m。[62](P146-151)这座窟开凿时的设计思想是要将两个大像窟合为一体,虽各有前室,但后室北壁共用,意在雕造两组并列的主尊及其附像。二尊并立,中间不隔开,是为了宣示二者的亲近关系,或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关系,恰是对冯太后、孝文帝现实关系的写照。方山之上,孝文帝万年堂祔葬于冯太后永固陵,也是同一思路的设计。但这种共用后室的双窟兴建一段时间后,或因为规模过大、工期过长,又遭舍弃,改而建造规模适中、中间有隔断、能及时完工的双窟,即第7、8窟,第9、10窟,第1、2窟等,其主尊尺寸都明显缩小了。双窟的主尊是将坐佛(倚坐或结跏趺坐)、交脚弥勒成对配置。第7窟后室北壁上层龛的本尊为交脚弥勒,左右是胁侍的倚坐佛;第8窟则相反,本尊为倚坐佛,左右胁侍是交脚弥勒。第9窟的后室本尊是倚坐佛,前室北壁下层的主尊为交脚弥勒;相反第10窟后室本尊是交脚弥勒,前室北壁下层主尊为倚坐佛。第1窟北壁本尊为交脚弥勒,第2窟北壁本尊为结跏趺坐的坐佛。[58](P197-200)双窟及其主尊就是用来表现"二圣"冯太后、孝文帝的。[57](P176-197)[63]冯太后生前占据强势地位,第7、8窟,第9、

10窟的倚坐佛代表冯太后，交脚弥勒代表孝文帝。冯太后去世后，第1、2窟的坐佛恢复为结跏趺坐，当代表终于完全掌握皇权的孝文帝，冯太后则回归交脚弥勒形象。

文成帝至孝文帝早期是平城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不仅成就了宏伟壮阔的云冈石窟，也广泛影响到世俗社会的各方面。从大量平城出土的墓葬中，可以看到佛教因素渗透和覆盖了此时期墓葬的各个要素，出现在墓葬壁画、各类葬具（漆木棺、石椁、木椁、石棺床、木棺床）及其附件（铺首棺环、石柱础、木帐杆）、各类陶器（平沿陶壶、平沿陶罐、盘口陶罐、直领陶罐、陶盆），以及陶马、石灯、铜饰件、漆盘等各类材质的其他遗物上。佛教因素的具体表现是忍冬纹、莲花纹和佛教人物三类。忍冬纹最多见，有单枝独立忍冬纹、连续波状忍冬纹、连续桃形忍冬纹等。莲花纹有忍冬叶莲花、团莲花、覆莲纹、仰莲纹等，比较丰富多变。佛教人物有化生童子、莲花佛像，以及成组的佛像、菩萨、飞天与供养人，出现频率虽然不高，但人物种类比较全面，除了地位较低的佛教神祇，佛像主尊也都出现了。[64](P113-175)

献文帝死后不久，孝文帝就将佛寺引入到帝后陵园的地面建筑之中。承明元年（476年），孝文帝下诏在献文帝陵前修造建明寺。太和三年（479年），孝文帝在方山起文石室、灵泉殿、思远佛寺。”[1](卷7上《高祖纪上》，P147)太和四年（480年），冯太后与孝文帝共游方山，冯太后表达了“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的愿望，孝文帝“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1](卷13《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P328-329)后来又开凿了方山石窟寺。这些都是为冯太后永固陵服务的。目前考古可证的永固陵陵寺一体的布局形式，正是在佛教深度影响下促进陵寝制度创新的结果。

佛教在平城的兴盛，耗费了大量国力，成为沉重的负担，皇帝开始转向控制和约束佛教的发展。延兴二年（472年），太上皇献文帝下诏禁止民间造寺，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上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1](卷114《释老志》，P3037)到孝文帝中、晚期，孝文帝逐渐引导僧人们从对物质供给的关注，转向专心研修义理，通过举办法会，让高僧在讲经论道中追求满足感。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下诏：“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太和十七年（493年），又“诏立僧制四十七条”。[1](卷114《释老志》，P3039)随着孝文帝从法律上不断加强对僧人的管理，平城佛教的热度也逐渐回归平常。

与佛教大起大落的情形相比，道教在平城的发展一直比较平淡，即便在寇谦之最受重视时期，也未对平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寇谦之之后，更缺乏突出的代表人物，文成帝、献文帝时期几乎无闻，以致于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将道坛崇虚寺从平城移出到桑乾之阴，规定“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1](卷七下《高祖纪下》，P168;卷114《释老志》，P3055)相比佛寺员额，道士总人数并不多。可见孝文帝在迁都前数年，对佛、道都采取了降低待遇、加强管理的政策。

结语

北魏平城文明的四大方面中，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是宗教文明，表现为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佛教文明，初步形成了“云冈学”。都市文明中，城址的基本布局和范围，宫殿、官署、礼制建筑等重要建筑的位置和形制大多还不清楚；关于城郊墓葬特征、文化来源和影响的研究近20年来有长足的进步，可算一个亮点。陵寝文明的探究长期蓄力，有待喷薄而出。以六镇为中心的军事文明，到目前为止还未系统发掘过一座军镇，资料不充分、全面，很难开展细致研究。总之，北魏平城文明内涵的深入揭示尚面临着许多难点和盲区，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曹臣明，马志强．北魏明元帝后期至文成帝时期的平城布局[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57-63.

[4] 曹臣明，乔丽萍．北魏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平城布局初步探讨[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42-45.

[5] 陈苏镇．东汉的“东宫”和“西宫”[J]．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8(89)：3.

[6] 李凭．论北魏正平元年事变[J]．晋阳学刊，1989(06)：58-66.

[7]（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钱国祥.中国古代汉唐都城形制的演进——由曹魏太极殿谈唐长安城形制的渊源[J].中原文物,2016(04):34-46.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5(04):485-513.
[10] 张庆捷,刘俊喜,左雁.大同操场城又发现北魏重要建筑遗址[N].中国文物报,2008-09-26(05).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操场城北魏二号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6(04):4-25.
[12] 朱庭枢.北魏建筑特征研究——以北魏平城一号殿堂遗址探究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3.
[13] 张志忠,侯晓刚,靖晓亭.山西大同古城发现北魏塔基遗址[N].中国文物报,2021-02-19(08).
[14] 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J].考古,2001(03):26-34.
[15]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02):26-34.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8] 曹臣明.平城附近鲜卑及北魏墓葬分布规律考[J].文物,2016(05):45-55.
[19] 倪润安.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22(02):85-92.
[20] 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J].文物季刊,1990(01):67-74.
[21] 张焯.北魏金陵考索[J].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1994(02):59-61.
[22] 古鸿飞.北魏金陵初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38-42.
[23] 刘溢海.北魏金陵探究[A].北朝研究(第六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4] 魏坚.金陵与畿上塞围——左云北魏遗存初识[A].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5] (美)A.G.温莱著,师焕英,张庆捷译.文明太后与方山永固陵[A].北朝研究(第十一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26] (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大同近傍調查記[A].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16卷上册《補遺》)[C].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27] 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A].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8]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J].文物,1978(07):29-35.
[29] 刘绪.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A].山西省博物馆八十年[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30]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J].文物,2007(04):4-26.
[31]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J].文物,1977(11):38-46.
[32]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J].考古,1981(06):521-530.
[33]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4] 张庆捷.北魏永固陵考察与探讨[A].而立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5] 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J].文物,2011(01):51-58.
[36] 王飞峰.关于永固陵的几个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1):19-30.
[37] 曹臣明.北魏方山永固陵地理环境的选择与陵园制度[A].中国古都研究(第十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8] (日)村元健一.北魏永固陵の造营[J].(日本)古代文化,2000(02):18-28.
[39] 王雁卿.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46-49.
[40] 沈睿文.永固陵与北魏政治[A].国学研究(第二十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1] (日)岡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學會1939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J].東方學報,2007(80):150-169.
[42] 胡玉春.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04):72-75.
[43] 魏坚,孟燕云.北魏长城考辨[J].文物,2019(07):66-73.
[44]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5] (清)沈垚.六镇释[A].落帆楼文集[C].嘉业堂刊本.
[46] 牟发松."六镇"新释[J].争鸣,1987(06):98-102.
[47] (日)佐川英治.北魏六镇史研究[A].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五卷)[C].上海:中西书局,2015.
[48] 周杨.北魏六镇防线的空间分析[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12):25-36.
[49] 张文平,苗润华.长城资源调查对于北魏长城及六镇镇戍遗址的新认识[J].阴山学刊,2014(06):18-30.
[50] 魏坚,谌璐琳.北魏六镇城址的考古学观察[A].北魏六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
[51] 张文平.北魏柔玄镇地望新考[J].北方文物,2021(05):88-95.

[52]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土城子遗址调查、钻探与试掘简报[A].西部考古(第16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53]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54] 彭丰文.守在四夷:北魏北部边疆经略方针及其思想源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03):96-105.
[55] (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造窟次第[A].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16卷上册《補遺》)[C].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56]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01):25-38.
[57]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A].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8] (日)冈村秀典著,徐小淑译.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59] 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J].文物,1994(10):56-63.
[60] 王洁.北魏孝文帝与龙门石窟古阳洞的雕造[J].考古与文物,2003(01):39-50.
[61] 杭侃.云冈第五窟当议[A].石窟寺研究(第8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62] 杭侃.云冈石窟第3窟开凿遗迹所反映的问题[A].石窟寺研究(第2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63] (日)曾布川寛.雲岡石窟再考[J].東方學報,2008(83):1-155.
[64] 倪润安.佛风入墓:北魏平城墓葬佛教因素的演进[A].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八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张月琴)

The Connotations of Pingcheng Civilization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NI Run-a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s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Pingcheng gathered the cultural factor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developed and created the Pingcheng civilization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included four aspects, namely urban civilization, mausoleum civilization, military civilization and religious civilization. Urban civilization revolved around the layout of imperial palaces, the setting of outer wal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tombs. The core of the mausoleum civilization was the Jin Mausoleum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and mappings of the Yonggu Mausoleum in Fangshan. In the north of Pingcheng, the Great Walls, the Long moats, the six major military towns, the fortress walls and other military defenses were distributed,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connotation of military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religious civilization has been promoted most deeply, manifested as the Buddhist civilization centered on the Yungang Grottoes. As a new academic system, Yungangology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onnotations of Pingcheng civilization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ren't well balanced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Pingcheng civilization; Northern Wei dynasty; four connotations